

1945—1949 年间

学界阵营分合研究

贺金林◎著

本书探讨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学界中人从抗战期间学术与政治之间形成的良好互动，到战后多数学人对政治渐有疏离的演变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他们围绕民族大义、学术振兴与政治立场等多方面的纷争，而导致阵营出现新的分化与融合。这也就为1949年大局变动前夕，学界中人不同的道路选择，作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诠释。

湘潭大学 出版社

1945—1949 年间
学界阵营分合研究

贺金林◎著

湘潭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45~1949年间学界阵营分合研究 / 贺金林著. —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81128-779-0

I. ①1… II. ①贺…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1945~1949 IV. ①K2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第 275346 号

责任编辑:王正杰

装帧设计:廖 铁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0731-58298966 邮编:411105

网 址:<http://xtup.xtu.edu.cn>

印 刷: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7

字 数:306千字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779-0

定 价:42.50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本著作为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学术与政治之间：抗战胜利后学界阵营分合研究(1945—1949)”

(项目编号：10YJC770029) 的最终成果

自序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小书，是我近五年来学术追求道路上的一个小结。2010年初，在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最终修改并提交书商出版的任务后，我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新选题，以便延续上一个阶段没有完成的工作。这时候，一直萦绕心头的20世纪40年代学界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变动，成了我学术追求道路的另一个方向。之所以选择这个新的方向，大概也与我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

1989年的那个夏天，我从一个师范学校毕业，尚是一个17岁的小青年。自己尚在懵懂之中，就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小学教师。此后从偏远的农村小学开始教起，继而中学，2001年硕士毕业后来到大学校园。虽然工作的地点时有变动，但教师的身份却一直没有改变。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毕业的我，只能算是一个相当于高中毕业的青年。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对社会的认识还是相当浅薄。想提高自己的学识，成为那个时期最为迫切的希望。在靠自学完成了大学学业的间隙，我也读了一些杂书。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还对文学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自费订阅了几年的《小说月报》，甚至在闲暇之余也写一点只有自己一个人看的杂感。不过在当年条件艰苦的乡村小学，我最终还是没有走上文学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颇为枯燥的历史专业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现在想来，大概与儿时的经历有着一定的关系。

我出生在一个农家，儿时是在祖父连续不断的故事声中长大的。他老人家出生于民国3年（1914年），在他的少儿时代，家中颇有一些田产，生活还算宽裕，因之他在私塾中也读了一些书。不过据他回忆，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家道开始中落，待他成家后，不得不为了生计四处奔波。特别是在日军到来之后，他和村中的几位青壮年还曾到距家有

着几百里之遥的三斗坪（此地现已建成了世界第一的三峡水利工程），贩卖食盐来补贴家用。抗战结束后，他又不得不四处躲藏以免被抓了壮丁。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家境已相当困难。不过随后没有被划分为地主成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在我的孩提时代，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夏天萤火虫飞舞的夜晚，坐在祖父身边一边享受着他蒲扇摇来的凉风，一边聆听他娓娓道来的各种侠义故事，夹杂的也还有先秦时期的纵横家传奇。

当年在乡村小学任教，学生放学之后，我的业余生活可谓相当乏味，找点书来读大概是唯一的选择了。（当年在乡村小学为稻粱谋之时，同事们放学之余最流行的娱乐项目便是一起围坐在四方桌前打麻将，但我从一开始便不太喜欢此项国粹。）记得那时学校书柜中有一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丛书，收录了大批自民国以来教育家的小传，为我了解近代学人们的经历与精神世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大概是我近距离接触中国近代学界中人的开始。此后长期浸淫在学园中，加之自己向来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内心深处可能就对学界中人有一种亲切感。不过我真正开始关注民国时期学界，已经是2004年进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事情了。此后我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学人们的年谱、日记与书信集等文献资料，对民国时期的学界有了大致的了解，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那些学人对政治的态度，以及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选择，与我们当前的状况有着太大的区别。所以，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有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那就是：为何民国时期的学界中人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取如此这般的态度？这种现象的产生，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本书将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自1905年科举废除以来，传统中国士人出现了严重分化。随着大批高等院校的兴起，大学教授这个群体逐渐壮大起来。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他们无疑是在社会上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他们在大学校园中传播知识，同时也把自己的理念传递给莘莘学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少数人则在大学校园与社会政治舞台之间游走，甚至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总体而言，大学教授群体中的多数人并不热衷

于政治活动本身，而是以另外的方式来影响政府，影响政治的走向。如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之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部分学界中人甚至对学生热衷于政治活动表示了相当程度的怀疑。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学界中人改变了以往不太热衷于政治的做法，开始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作出一定的选择。加之此时国民党加强了大学校园中的组织建设，大批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大学区党部的成立，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大批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不过大学教授们入党的动机区别很大，各大学直属区党部的运行情况也有着天壤之别。在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一些大学校园，出现了学术与政治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的情形。而在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各大学直属区党部退出学校，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影响力被削弱。学界中人在大学校园关注政治的同时，更为关注学术的发展。抗战期间的学术低落是大家普遍的感受，抗战胜利后，各校为争夺办学资源而产生纷争，在延续战前派系斗争风格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此同时，抗战胜利之初收复区与后方学界围绕民族大义的争论，更是让此间的阵营分合复杂化。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何大多数学界中人选择了留在大陆，而非跟随国民党政府败走台湾，抑或是远赴异国？传统的说法是，他们对国民党极度失望，转而寻求一个新的党派来建设一个新的中国。然而通过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大学教授群体的政治观念与政治倾向，无疑对他们的最终选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导致他们作出不同选择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对如何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以及如何振兴学术的思考。本书将从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视角进行研究，希望对1945—1949年间学界中人如何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从民族大义、学术振兴与政治立场等三个方面的变动，作出一个新的诠释。

这本小书的最终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学术追求道路上三位重要的引路人。1998年9月，在中小学耕耘9年之后，我有幸来到长沙岳麓山下，在郭汉民先生的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当年先生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学者，那年希望跟随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很多，但先生因为指导学生的任务繁重（除了几位硕士之外，还要指导几名博士生），只能在希望跟随他的几位硕士研究生中挑选一名，我最终被先生选中。跟随他的

三年里，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他都对我照顾很多。在毕业之际，考虑到自己已近而立之年，我没有听从他的意见直接读博，而是选择了来到桂林这座城市谋生。每当遥想往事，对当年先生的期许，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也为自己这么多年来未能如先生所愿做出一点成就而感到惭愧。2004年9月，我遇上了学术追求道路的第二次重大机缘。由于自己在桂林工作，为方便起见，我选择了与桂林相距不是太远的广州去攻读博士学位。在康乐园，我有幸成为周兴樑先生的学生。周先生和郭先生是1960年代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民国史专家，他对孙中山的研究更是享誉海内外。在康乐园的三年，我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层面来探讨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得失，最终完成了较为浅薄的论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复员研究》，顺利通过答辩。论文从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教育体制的转变两大线索，分收复区、光复区与后方三大区域，对1945—1947年间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导的教育复员运动作了较为详细的回顾。论文通过答辩后，又经过三年较为仔细的修改，于2010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算是对我将近10年的学术追求之路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就是在这一年，第三位引路人郑大华先生作为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将我的学术追求道路重新引向了近代思想史的方向。对于此次从事博士后研究，郑先生曾开玩笑说我“是没事找事”。不过对我来说正好是在这种“没事找事”的状态下，找出一点事情来做，这也正应了别人说的那句话：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正是闲暇时的产物。经过与郑先生商谈，我最终选择了“1945—1949年间学界阵营分合”作为选题，并于2013年5月完成了最终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本书正是与他多次商讨的结果。

这本小书的最终出版，还得感谢教育部在2010年立项的青年基金项目提供的资助。博士论文修改完成后，接下来该从事哪个方面的研究，我一时间感觉有点迷茫。在提交了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请后，我的战后学界阵营分合研究课题得以立项。与撰写博士论文不同的是，立项课题更侧重于学人群体思想层面的研究，我首先面临的的就是文献资料奇缺的问题。截止到课题立项时，公开出版过的相关文献资料不是很多见，而我的研究对象——那个时期的学人群体则数量

庞大，他们大多与当时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能否查阅到朱家骅档案，成了此项研究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所在。

2011年5月，我有幸获得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批准，作为访问学人前往该所访学。此后因为办理相关手续时间较长，待到正式成行，已经是11月了。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为期一个月的访学日子里，我深深为台湾独特的自然风光所陶醉，更为得到两岸学界朋友的大力帮助而充满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我在“中研院”访学的联系人、近代史研究所的潘光哲先生。在短短一个月的访学中，查阅该所档案馆馆藏的朱家骅档案是重中之重，我不仅摘抄和复印了大约40万字的档案资料，而且还在潘先生的介绍下，购买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刚刚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一套三大本，省去了全面查阅傅斯年档案的时间。我还有幸拜会了在2005年就曾与其有书信往来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罗久蓉女士。当年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得到过她的帮助，并一直对她从台湾惠寄她自己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上所发表论文的抽印本心存感激。见面细谈起来才知道，她的姑丈伍家宥先生是我家乡的知名人士（民国时期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久蓉女士的伯父是曾长期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而她一直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对民国时期的学界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在离开台湾前，得以获赠由她主编的《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这让我的台湾之行更添了一层意义。此外，我在与近代史研究所的林美莉女士、张啓雄先生、张力先生、黄自进先生等人的交往中，也多有请益。我在访学时，恰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栾景河先生、吕文浩先生等也在台湾参加学术活动。虽然大家初次见面，但是他乡遇到知音，交谈甚欢，也让我这个后学受益良多。（栾景河先生在今年年初已因病离世。遥想我与栾先生相识之后二人前往垦丁畅游的情景，他那东北汉子的爽朗与友善，以及在后来的多次交往中他对友朋的关怀与牵挂，都让我感慨良多）。对所有这些学界朋友的提携与帮助，我的感激之情都寄托在了这本小书之中。

从2001年硕士毕业后来到了桂林至今，我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十多年，也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虽然工作单位是一所工科背景的学校，在

很多人眼中，我们这拨人有点“另类”的味道，但我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也颇感满足。在如今这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能否赚取更多的钱，似乎已经成为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尺，但我一直难以跟上这股潮流。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父母亲相继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无法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我的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直离不开他们生活的那片乡土。即便是随我到桂林小住一两个月，也总是挂念着家乡。我作为儿子，却无法常伴他们身边，每念及此便心中黯然。亲人一个个离去，我已进入不惑之年，生活节奏开始慢了下来，也会不时思考人生的意义。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各界友朋们的帮助与支持。虽然长期在校园中生活，社会交往不多，但志同道合者不少。本书的最终完成，离不开他们的鼓励与嘉许。书中的有些章节，我曾在洛阳、长沙与西安召开的三次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会议论文提交过，并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批评意见。对前辈与同仁们的谢意，也一并体现在此书最后的修改中。同时，本书的撰写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太太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儿子这几年也正好在中学阶段，明年就要完成高中学业。他们和我一样，适应了桂林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家庭的和睦是我进一步在学术追求道路上前行的动力。

由于本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至为广泛，所涉及的学界中人更为庞杂，笔者在撰写过程中可能挂一漏万，偏颇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大家在阅读之后提出宝贵的意见，也欢迎尖锐的批判。学术正是在这种意见与批判声中，才能得到进一步弘扬。

是为序。

贺金林

2014年10月30日于桂林

目 录

绪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学术史	3
三、研究目标、内容、方法、重点和难点	12
第一章 抗战胜利之初的民族大义之争	17
第一节 各地临时大学补习班的开办	18
第二节 围绕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的分歧	28
第三节 傅斯年与伪北大的处置问题	43
第四节 南北临时大学补习班开办过程中的异同	55
第二章 学术振兴中的困境与派系纷争	74
第一节 学界中人有关大学行政化的讨论	75
第二节 学人群体振兴学术的努力与困境	88
第三节 南派纷争：以抗战胜利前后中央大学校长更替为例	104
第四节 北平学界各大学之间的派系纷争：以北洋大学北平部与北平师范学院为例	113
第三章 学界中人与大学校园中的党派纷争	131
第一节 国民党大学直属区党部的成立与运行	132
第二节 教授入党的动机与党部退出学校后的政党生态	156
第三节 三青团与大学校园中的国共斗争	167
第四节 读书会与大学校园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178

第四章 学界中人对形势的判断与出路选择	189
第一节 学界中人对“新中国”的憧憬与向往	190
第二节 学人眼中的国际形势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02
第三节 中间路线的幻灭与出路探讨	213
第四节 在官府与学园间的徘徊以及大局变动前夕的选择	224
结 语	242
参考文献	250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自近代我国高等教育诞生以来,学界中人在“传道、授业、解惑”之余,在学术追求的道路上耕耘不辍。他们与现实政治之间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间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反映出他们的矛盾心态。而当现实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这种心态表现得尤为明显。1945年前后,当历经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之时,尽快结束战时状态,进入和平建国的正常轨道,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也是摆在国人面前的新选择。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四年多时间里,在国内与国际局势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学界阵营经历了急剧的分化与融合,学界中人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此间学界的分合不仅表现在因为学术纷争而导致的阵营分化,而且还体现在学界中人政治立场的不同或变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学人们是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还是跟随国民党远走台湾,抑或是出走海外观望?不同道路选择,便是此种分合的集中反映。1945—1949年间学界阵营的分合,不仅直接导致了全国高等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地域分布出现新的形态,而且还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教育与学术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探讨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之际学界中人不同道路选择的原因时,大多简单地将之归结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而导致的他们对国民党的失望。然而现实情形却并非如此的单线条,导致抗战胜利后学界阵营出现剧烈分化与新的融合,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对此种阵营分合线索的追溯,还得将之放在那个色彩斑斓的整个民国时代。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学界中人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导致学界阵营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学术与政治的良好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在抗战胜利之后却开始沿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虽然学界中人对

现实政治变得不再像以往那么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脱离了现实政治。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在关心国内政局发展动向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在 1949 年大局变动前夕，学界中人所作出的不同选择，无疑是一个长时间思考的结果。而从抗战胜利前夕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四年多时间，更是影响到他们作出最终选择的关键时期。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影响到了学界中人在 1949 年大局变动之前所作出的不同选择，这些因素又是有着怎样的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本著作将着重探讨抗战胜利后在时局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学界中人如何在民族大义、学术发展、党派纷争以及对国际国内局势判断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新的阵营分合，以揭示学界中人如何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实现互动，并以此来解释他们为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不同的道路选择。本书所涉及的学界，更多的是指高等教育界，也就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大学校园中的师生，而有关学界阵营的概念，则更多的是指由于思想观念、学术派别与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导致的大学校园中间出现的群体派系。本书所关注的阵营分合，则更多是指从此种群体派系因为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变动过程的探讨。

研究 1945—1949 年间学界阵营的分合，探讨学界中人在时局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下所作出不同道路选择的思想轨迹，这不仅对进一步拓展民国思想文化史与政治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深入探讨民国时期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不无裨益，将为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战后初期国民党与学界互动的失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教育史与学术史的范畴来看，1945—1949 年间学界阵营分合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随着抗战期间大批高校的出现，以及高等教育资源在全国分布的新变化，导致抗战胜利之后各大学之间为争夺办学资源展开激烈的竞争，当然也必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关系。这种竞争与合作关系，也充分体现了学界不同派别之间的纷争。各大学在抗战胜利之后均有扩大办学规模的设想，然而现实情形却是，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办学条件均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作为高等教育的主管机关，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朱家骅部长的主持下，对各个高校的此种竞争与合作关系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手法。学界中的派别纷争在此竞争与合作的过程

中不仅在延续过去的传统，而且还开始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形态。

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范畴来看，学界阵营的分合无疑是集中反映了学界中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也是国内政治局势变动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抗战胜利的即将到来与一个“新中国”的即将出现，为思想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在抗战胜利与新中国成立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学界中人对政治活动的关注，以及他们对现实出路的探讨，无疑均是我们深入了解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思想与政治倾向的一条重要途径。1945—1949年间学界阵营出现新的分化与融合，不仅集中反映了此间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政策演变过程，而且还体现在学界中人为复兴学术而付出的艰巨努力。与此同时，通过对国民政府在学界阵营剧烈变动中的教育政策成败得失的探讨，以及国民党如何在大学校园中进出，均为我们当今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的大学校园文化与建设一流大学，以及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等多方面的问题提供非常直接的现实借鉴。

二、学术史

有关1945—1949年间学界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关注的焦点则有所不同。由于自1945抗战胜利到1949年国民政府的最终垮台，这期间过于短暂，再加上国内局势的动荡，学术界无法对学界阵营的分合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当时在资料整理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尤以教育部编撰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最具代表性。这部1947年最终成书的教育资料总集，是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继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之后主编的又一部重要的有关国民政府教育发展的资料汇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对当时国内各高校的情况，均有比较简单的叙述。总的说来，此一时期对于1945—1949年间学界的研究尚未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以下以时间与专题为经纬，对1949年以来国内外有关学界阵营分合方面的研究作一大致的回顾。

1. 1949—1979 年的研究状况

大致说来,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受到以革命史为研究导向的研究范式的影响,学术界更多从中共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运行与组织发动的视角出发,关注的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校园中的政治斗争。比如对大学校园中的青年学生运动的研究,尤其是中共方面如何与国民党争夺青年,成为学术界此间关注的热点话题。20 世纪 60 年代,国内学术界虽然曾有过关于加强民国史研究的呼声,但在以革命史为研究范式的背景之下,当时民国史的研究现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陈景磐先生《中国近代教育史》为代表的教育史著作,基本上未予涉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发展情况。即便有些论著对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发展有所论述,但其研究的范围也主要集中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上面,且大多从内战的角度分析国民党衰败的原因,而对国民政府方面所出台政策的研究则明显不足。此后,一些学者所出版的教育史的论著,也摆脱不了以国共两党斗争的这条主线为叙事方式的格局。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教育发展的研究,更是主要集中在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共反人民的教育政策的层面。少数学者在以西南联大等几所大学为中心,探讨抗战胜利以后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时,也仅仅是从大学师生们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角度展开论述。此间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曾经担任国民党高层职员,或者是曾经担任大学教授的一些教员们,对民国时期学界的情况有过一些较为详细的回顾。这些回顾大多以全国政协或地方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的形式,定期或不定期汇集出版。虽然受到当时时代背景的限制,他们的回顾大多对国民党统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带有较为强烈的批判色彩,但其中的史料价值仍然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国史的研究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取得了许多令人满意的成果。由李新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是此间民国史研究最为集中的成果。这部由许多知名学者参与编撰的巨著,对国民政府统治的 20 多年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开创了民国史研究的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纵观 1980 年代的研究，学界主要的视点还是集中在政治史与外交史方面。对民国时期大学校园的研究，则多从学人个体出发。如此间的一些个人传记对学界中人的学术发展的努力涉及较多，一些大学在编写校史时，对民国时期学界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所反映。1980 年代初影响深远的是一批民国时期的资料编纂，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最具代表性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对胡适来往书信的选编，成为学术界研究学人群体的一大重要资料来源。

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学术界对抗战期间的全国教育发展情况关注较多，特别是抗战期间高校内迁对大后方教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一些关于民国教育史的研究论著虽然对抗战胜利之后高等学校的情况有所提及，但大多也仅仅是一笔带过，其中论述稍微详细的当属熊明安先生的《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作者对于战后各高校教授群体的情况作过一定的论述，但此书所利用的资料单一（仅仅利用了《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无法反映出整个学界阵营的全貌。其他的论著仅从某一方面涉及了战后的教育发展问题，但对此间学界阵营究竟有了哪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产生的，大多未能展开深入的探讨。研究民国时期教育史的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即历史学界的民国教育史研究与教育学学界对于教育史的研究。由于各自采用的方法与对材料的取舍不同，因此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也就大相径庭。对于教育史专业的研究者来说，他们更多注重的是对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发展结果的研究，而对于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政策的变革却往往不太注意。从历史学的眼光来看，研究教育史更多的应该关注于教育变革的过程，而不仅仅局限于最终发展的结果。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学术界有关 20 世纪 40 年代学界阵营的研究开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此时关注的重点与 1980 年代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对各高校情况的研究，成了一时之间共同关注的对象。叶文心认为，自中国高等教育诞生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大学，一直呈现一种“异化”现象，即大学与当时的政治及社会都有脱节。虽然国民党在大